

北京文学
创作丛书
BEIJING
WENXUE
CHUANGZUO
CONGSHU



李惠薪小说选

北京出版社



2 035 8058 9

李锐新

小说选



北京出版社

丛书设计：王 晖

本书设计：任建辉

·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·

李惠薪小说选

出版：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 京 印 刷 二 厂

787×1092 毫米

32 开本

15.35 印张

252,000 字

1982 年 7 月第 1 版

198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 1—33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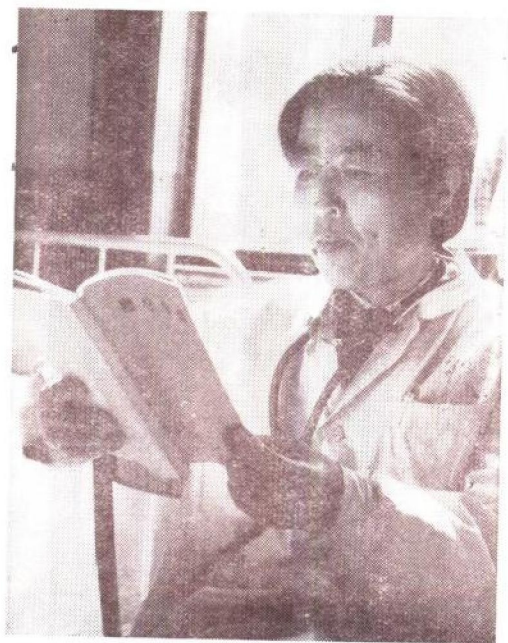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 10071·5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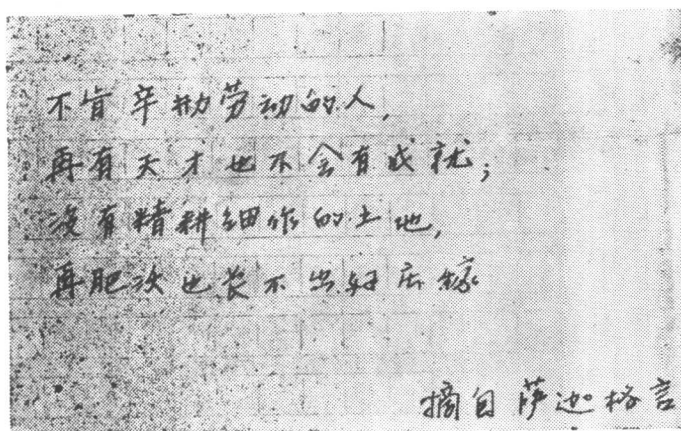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： 1.05 元

李名新

不肯辛勤劳动的人，
再有天才也不会有成就，
没有精耕细作的土地，
再肥沃也长不出好庄稼。

摘自萨迦格言





不肯辛勤劳动的人，
再有天才也不会有成就；
没有精耕细作的土地，
再肥沃也长不出好庄稼。

摘自萨迦格言

作者手迹

.....

我的老师

(代序)

我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三十年前，一个严冬的清晨。在原中国作家协会的旧址，一个朱红油漆的大门前，站着一个小姑娘，由于个子小，不得不踮起了脚尖，在注视着门楣上钉的蓝牌牌：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。

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，仔仔细细地核对了一下，才放下心来。这是昨天下午她从学校文学组长那儿打听来的。这时她才发现门旁挂着中国作家协会的白色大木牌，不好意思地伸了伸舌头，仿佛被人们窥探到了她的粗心大意一样，光顾了找门牌，连这么醒目的标记都没有看见。

朱红大门紧紧地关着，她发现街上还静悄悄的，偶尔才走过一两个行人。现在是几点了，她不知道，她还是按着平时上学的钟点起来的。可今天是星期天，劳累了一个星期的人们可能在休息日要睡一会儿懒觉的，他们究竟不

同于初中二年级的学生。既然已经来到了目的地，她也就蹲下心来，耐心地等待着。

过了很长的时间，传达室的老大爷出来打扫大门口。看见这个冻得满脸通红的、梳着娃娃头的小姑娘，她在不停地跺着两只脚，十只胡萝卜似的手指头，挠在嘴边，用那不断地冒出来的白色哈气温暖着。由于老大爷的突然出现，小姑娘没有思想准备，竟微张着嘴半天没有讲出话来。

老大爷上下打量了一下女孩子，有些纳闷儿：大清早她站在这儿干什么？

“作家张天翼是住在这儿吗？”小姑娘胆怯地问。

“你认识他？”老大爷没有正面回答。

“嗯！”她点了点头，随后又有些慌张了，急忙补充说，“我认识他，可他不认识我！”

老大爷笑了，他非常喜欢那些憨厚的、说实话的孩子，就关心地问：“你找他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是这样！”小姑娘忽闪着两只大眼，羞怯地说，“我写了一本书，想请他看看！”

“什么？”老大爷以为自己的耳朵背，没有听清楚，又问了一遍。

女孩噤了片刻，认真地说：“我写了一本书，想请他看看。”

这次老大爷确实听真切了，看着眼前这纯朴的、胖敦敦的小姑娘，从她那真诚、无邪、坦率的面孔上，可以看

出她不会说谎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很喜欢她……甚至有些心疼她。他耐心地解释说：“孩子，这是星期天，人们都不上班。再说，要想见到张天翼同志是要事先约好的。”

小姑娘好象早就有所准备，背书似地嘟囔着：“我是中学生，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。今天我比平时早起了一个钟头，是从西城走到这儿的……。”

老大爷被女孩子的话语感动，她虽然没有祈求，没有哀告，但他早已被她赤诚的心所感动，他竟忘了打扫街门，扫帚也扔在了门外，连声说：“我去打电话联系一下。”

女孩子用感激的目光送走了老大爷的背影。

不一会儿，老大爷乐呵呵地走出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去吧！你可以进去了！”

不知道老大爷在电话中介绍了一些什么，小姑娘被破格地接待了……。

就是这样，我第一次看见了张天翼老师。当我用冻僵的手费劲儿地从破书包里掏出《春天的花朵》这部小说的初稿时，我又有些不安了。因为这部长达二十万字，用来描写自己生活的小说，是用蓝色的墨水密密麻麻地写在铅笔写过的习题纸上，字虽然写得还算工整，张老师读起来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

他微笑着小心地将书稿拿过去，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，用他细长的手指将揉皱的封面抚摩平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向我的老师交上了自己的课余文学作业。他呢，从此也就自愿地承担了批改我的拙劣作文的义务。其实他何止是

教导我如何作文章，对我整个的一生如何作人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。

《春天的花朵》看起来是相当费力的，特别当人的年龄逐渐增长而视力减退的时候，现在我自己有了亲身的感受。但张老师竟耐着性子仔仔细细地阅读了，并在那写满密密麻麻铅笔字的习题纸上，认认真真地做了批改。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把我又叫到作家协会进行了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。

在我和他接触的近三十年中，他从来都不以长者、教训者的姿态出现，总是平等相待，在他的房间里遇到了其他的作家或他的朋友，张老师都会认认真真地把我介绍给他们：“这是我的朋友。”

我是个胆小、腼腆、有些怯生的人，可到张老师家中作客，我从来都没有拘束、不自然的感觉。

我摸透了他的脾气，平时他很难得夸奖一个人，如果不批评你，没有指出你的不足之处，那对于你就是褒奖。

张老师对《春天的花朵》的评价是：“你年龄还太小，不能驾驭这么多的材料，虽然有很多情节是感人的，可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。有些独立成章的，可以优先发表。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他帮我把书中的第四章——《枣》，整理出来，是他告诉我如何抄写在稿纸上，如何写题目，如何点标点……等等，说实话，比语文老师教的还要细致、具体。

《枣》，这个短篇发表在《新观察》上，因为小说中描写了

少先队员热爱志愿军的赤诚之心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远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叔叔，戍守边疆的解放军战士……从全国各地雪片似地纷纷寄来了几百封信件；电台里不仅多次广播了《枣》，还要我去讲话；报刊来找我要拍照片，以备留档做资料，这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，真象眼花缭乱的万花筒，被搞得神魂迷乱。张老师早就预料到我会碰到这种情况，为此，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。我把张老师给我的一些信视为珍宝。虽然经过十年内乱，几经抄查，竟保存下来。它们在我前进的道路上，起了指导的作用；它们对于我来说又是一面无瑕的镜子，使我能清晰地、真切地看见自己。

惠薪：

刚才接到三十日发的信。志愿军叔叔自己做的书签真可爱极了。这是一件极可珍贵的礼物。我把它好好保存着，连陈列都舍不得陈列，怕把它沾上土。

团组织的意见我认为是对的，最好是用集体名义回信。老老实实告诉志愿军叔叔们，李矗是个创造出来的人物，什么地方有团所领导的少先队，什么地方就可能有李矗。二甲班也是这样综合起来的。青年少年们怎样热爱叔叔们，这里不过是个例子，写不完，也写不充分。……我认为应当把这真实情形写给来信的叔叔们，或者一封

一封地复，或者——和《新观察》交换一下意见，是不是还可以在刊物上答复。

你有没有请求入团？郝钧曾来一封信，告诉你这学期怎样积极工作，关心集体的事。我高兴极了。希望你能象要求一个团员似的要求自己……。

.....

中学的六年期间，我一直坚持了业余写作，写成《金日成元帅来信了》、《鱼和菊花》、《小队的秘密》、《服务》等。一九五六年，我出版了儿童文学短篇小说集《枣》。当时××刊物想让张老师为我写一篇评论文章，并动员我去催促。为此我去找过张老师，那时我把问题看得很简单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！写这样一篇稿子我想对他来说丝毫也没有什么困难，可这次他表现得很固执，虽然他给我讲了些理由，可我听不进去，也不能理解，记得那次我是快快不乐而离去的。

过了没有几天，张老师在百忙中为我写了一封信，应该说接到信后我郁郁不欢的心情虽稍有减轻，但我仍然不能理解他用心的甘苦。直到我长大后才体会到了他对我的精心爱护和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在我的身上灌注了苦心匠人的心血。

惠蔚：



收到你的信时正天下乡(这个工作要到一月中旬才可以结束)，本想约你来谈一次，又不知哪一天什么时候恰好两个人都有空。

.....

.....我读你的那几篇时很高兴，因为眼看你所写的东西有了进步。但更高兴的是，眼看你在政治上、在思想上有了进步，而且你是在不妨碍学校的学习和工作的条件下学习写作，并有了进步。要拿这几篇来分析，写出文章，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但那样一来，实际上就会使读者有这么一个印象：这个刊物把这几篇作品当作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榜样。好象是说，要这么这么写才会有这样的成就。那样一来，对谁也没有好处，而对你——可特别有害处。

刊物也许是想叫人特别重视它所登载的作品，.....叫我来写，是因为知道我是关心你的，有的人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：“这是你自己的孩子，你还不捧捧她？”

不错，这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关心她，但我应当是有原则地关心她。假如只一味为自己孩子挣一个“名声”，那就害了她，那就不配接受她信上所写的称呼“老师”。

惠新，我告诉你这些，并不要向你解释，而只是想借这件事讲讲这个道理。我知道你不会闹

什么情绪(你会么?)，——如果闹情绪，那就得好好分析一下，看是由于一个什么根源。我对你的要求是严格的，尤其是有关品质方面的事，我对你要求得更严格，要求你真正不愧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青年。

还有，你写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会给送到什么选本里面去。我预先提醒你：切不要因此骄傲自满，以“作家”自命。发表的文章愈多，读者愈多，就愈要警惕自己的自满情绪，愈要感到自己对读者的责任。应当具体地体会到：一切工作(写作在内)都是为了替群众做事。

有空，还是得练习写。当然，我想你不会忘记你对我提的保证：现在不会因写作而妨碍学习、工作和锻炼身体，将来不会因为写作而妨碍你所从事的建设工作。这样，写作本身也才会有可靠的根基。……

高三毕业，面临着今后我应该走什么道路：学文，学工还是学医，我站在三岔路口上。来自学校、社会上的议论是怂恿我学文，人们都觉得我似乎有这方面的才能。当我去征询张老师的意见时，他说：“要想当舞蹈家越早越好，要想当作家越晚越好，大学里的文学系不是培养作家的，你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考上理想的理工科或医学，要有一种脚踏实地地为人民服务的本领，切不可幻想做一

个空头的文学家……。”

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我每次向他汇报年终获得学习优秀奖奖章，他表现的高兴劲儿远远大于我发表文章时的兴奋。

这样我就投考了医学院。

在和张老师的交往中，有时我也表现出自己的执拗，在不妨碍原则的前提下，他很迁就我，有时这样我反而常常自责。

我去找张老师常常是在下课后，有一次正碰见他家里有客人吃饭，其实人们是好意地、真诚地拉我入席，可我非常不习惯这种场面。当我刚刚走进屋子时，我就下定了决心，不管多少人动员我，我只重复一句话：“我吃过了！”最后，张老师只得让我到他的书房去等他。

显然这顿饭他也没有吃好，不一会儿他就来看我，认真地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吃飯？”

“我吃过了！”可肚子偏偏不做美，此时竟“咕咕”地提出了抗议。

张老师笑了。

我却急得险些儿哭出来：“我不习惯，而且也吃不饱！我在这儿吃了，怕回家去妈妈等着我！”我说的是实话，不论我回家有多么晚，过完团组织生活也好，出完板报也好，上完晚自习也好，妈妈总是等着我，我不能一个人在外边吃。

从此张老师从不勉强我在他家里用饭，他知道尊重别

人的习惯。

一九六五年底，在我当了一名临床医生以后，写了一出五幕四场的话剧——《放声歌唱》，张老师曾约我去谈进一步修改的意见，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就爆发了。

全国作协被砸烂了，张老师也被“揪”了出来，抄了家，轰出了作协，赶进了“牛棚”……。

由于批判“老爷卫生部”，我虽是个不足挂齿的小人物，也受到了牵连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都是远离首都的“宦游人”，云南、西北、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广西，……很多偏远的山区我都跑遍了，虽然我吃尽了苦头，也开始认识了社会。

这期间我接到过一个红卫兵的来信，要求我——彻底揭发张天翼，把他的信件交出来，对于这种来信我表示了沉默。

一九七一年我由西双版纳巡回医疗回来，张老师托人带信给我，说他已经从江西干校回到了北京。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医院很近，第二天下午我就跑去看他。

那天天气不好，房间里光线很暗，当我突然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张老师呆呆愣愣地看着我，半天才高兴地失声嚷起来，“惠薪！”

那时正值我写完了长篇小说《澜沧江畔》，张老师虽然身体很不好，可他主动地为我承担了看稿的任务，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，他仔细地看了，还象二十年前一样，把错别字、标点符号都给我改过了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：为



了和编辑同志们一起讨论《澜沧江畔》的修改意见，他顶着呛嗓子的西北风，徒步从家走到朝内大街。对于他这个长期因肺结核、慢性支气管炎而造成肺功能不全、肺心病的老人来说，真是一段不算短的路程。

即使在“四人帮”猖獗横行的那些日子，张老师从来没有放松对我在业务上的要求，那时他就督促我坚持业余学习英语，他在去首都医院看病的时候，还想着为我买来了外文卡片，一再叮嘱我学习英语，搞好文法很重要，又为我买来了医用语书，他还时常检查、督促我的出勤情况。

七四年底，××刊物有一个去山西吉县采访的任务，当时山西局势不太稳定，派仗打得很厉害。加上冬寒时冷，采访的地点又是山区，在一些人们的眼中看来，这是一件苦差事。那时北京市正要召开一个文艺创作会议，已给我发来了通知，经过考虑，还是决定到山西去，张老师当时也非常支持我的行动。就这样，十二月中旬我冒着纷纷扬扬、铺天盖地的大雪从北京出发了，在到达吉县中垛原的第四天，由于晚间采访迷路，跌下山沟，将腰椎摔断了……。

谁能想到就在我回京卧床养伤的半个月后，张老师因为脑血管疾病也躺下了。

当我刚刚能被人搀扶着下床走动的时候，我去医院看他，他很高兴，立刻做练习腿、手的动作给我看，他右手写字不灵活了，就用左手练习，表现出了与疾病做顽强斗

争的毅力和决心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表现出了“身残心不残”的崇高品质，为我树立了表率。在养伤的过程中，他也不例外是我的老师。

张老师患了脑血管病以后，虽不能象以前一样，详细地为我批改文章，但在关键的问题上，仍然不怕麻烦、不辞辛苦地帮助我！指导我！

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”。时间一晃过去了，对我来说，我所走过的路并不是铺满鲜花的、璀璨似锦的坦途；甚至是充满了荆棘、坎坷；有泪也有血。张天翼老师对于我把握自己一生的方向起了决定性的、导航的作用……。

他不单单用自己的教诲，也用他自己的行动。

《北京文学》1981年第3期